

冷 战

[美] 李普曼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冷 战

——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美] 李普曼著

裘仁达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59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系根据美國哈潑兄弟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華爾脫·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著“冷战: 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一書譯出。

作者从1931年起主要担任“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專欄作家。本書出版前即曾在該報連載。他对國際局势和美國外交政策的一些看法, 代表了美國一部分壟斷資本集团的意見。他对执政者政策和策略的批評, 可以幫助我們从一个側面來看战后美帝國主义侵略政策失敗和破產的情况。本館出版這本書的目的是提供反面教材, 作为研究美帝國主义外交政策的参考。

冷 战

[美] 李普曼著 裘仁达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装

統一书号: 3017·17

1959 年 4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9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40 千字

印张 1—9/16

印数 3,001—3,800 册

定价 (9) 0.24 元

譯 者 序

华尔脱·李普曼是美国当今有影响的新聞評論家。作为“紐約先驅論壇报”的特約作家，他每天写一篇千字左右的短评，专栏題为“今天和明天”，同时轉載在資本主义各国的二百七十多家报纸上，总銷路估計有二千万份。

他于1889年出生于富有的德国犹太人移民家庭。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青年时受过英国費边主义的影响，成名后投靠垄断資本，和摩根系最为接近。

自从1931年以来，他就一直为“紐約先驅論壇报”写文章。本書是他的一系列文集之一，写于1947年，是針對当时由乔治·凱南所闡明的杜魯門主义的批評。这是二次大战以后，他第一次用脫离接触政策来反对遏制政策。这个題目代表着李普曼的一个中心思想，不过在具体問題的看法上他也常常先后自相矛盾。

李普曼反对遏制政策，只是在策略上不同意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而不是和打着反苏旗帜的侵略政策和实力政策有什么根本性的分歧。他自己說：“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力量，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設計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濫用美国的力量。”

李普曼这本書的整个反动立場集中表現于他污蔑苏联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时又吹嘘美国的政策传统是扶助其他国家的独立。李普曼对局势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較清醒的估計，当然这种清醒的估計是极有限度的。他認為改变一下做法，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长远利益更为有利。他反对分散力量，主张利用集中的强大

的威懾力量（空軍和兩栖部隊——當時美帝國主義還自恃擁有原子武器的壟斷）；他反對在歐洲駐軍，主張在雙方撤軍之後在東歐人民民主國家里搞顛復活動；他出於猶太人仇德的民族情緒，主張把德國中立化，防止它的軍國主義力量東山再起；他附和在中國干涉業已失敗而回到美國擔任國務卿時期的馬歇爾，認為美國不應該在中國“卷入我們獨力所不能解決的爭端”。

李普曼的這本書，暴露了美國侵略政策的失敗和破產。他無意中承認了美國打着反蘇的幌子，實則對資本主義世界中的許多國家進行着干涉和魚肉。他說：“執行杜魯門主義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國）不斷干涉所有那些號稱是在遏制蘇聯的國家。”美國在這些國家里培植着騎在人民脖子上的反動傀儡，美國駐這些國家的外交代表隨時在向政府建議，“應該提名誰，津貼誰，為誰粉刷，把誰看得比事實上更好一些，吸收誰做我們的雇員和盟友。”這種情況當然不能不引起當地人民的不滿，使這些地區形成了象李普曼所說的“一鍋沸騰着內爭的稀粥”。

他也承認了美國和它的“天然盟國”——大西洋各國的關係是不很美妙的。這些盟國“不願象那些邊緣國家一樣，成為美國的雇員，听任美國干涉它們的內政，為取得我們的支持而必須听命於華盛頓”。它們尤其害怕美國戰爭狂人的冒險行為，對一旦爆發世界大戰，自己將“被置於鎚和砧之間”的地位忧心忡忡。因此天然同盟在進行着分化。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帝國主義是異常孤立的。李普曼顯然意識到美國這種弱點畢露，處處被動，進退兩難，孤立無援的狼狽地位。但是他不能，當然也不可能，更深一層地認識到，他們反對的這種分散力量，到處駐軍的策略，原是帝國主義反動派在走下坡路時所不得不採取的策略。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難題就在於：

他們脖子上的絞索正在越抽越緊，而這些絞索又是他們自己套上的。

李普曼這書出版以來的歷史證明，帝國主義從來也不可能自動脫身，他們只有在被人民狠狠踢一脚的時候，才夾着尾巴逃出來。

1959年1月

著者原序

1947年7月的“外事季刊”上出現了一篇題為“苏联行为的来源”的匿名文章，不久“生活”杂志又加以轉載。这篇文章，单凭它的質量，就应该引起广泛的注意。因为它显然出于一个曾用有訓練的眼光和有教养的头脑密切观察过苏联政权的人的手笔，这个人得出了一個理論，來說明苏联政府的行为“并不反映对和平和稳定的抽象的热爱，并不反映对社会主义世界和資本主义世界永久愉快地共处抱有真正的信心，而却反映了一种持續的压力政策，企图破坏和削弱一切敌对的势力和权力”。

華盛頓的几个第一流的記者几乎立刻就猜测这位署名为X的作者乃是乔治·凱南先生，他在美国駐莫斯科大使館任职之后，刚被馬歇尔国务卿指派为国务院政策計劃參謀室主任。这种猜测沒有遭到否認。这样看来，X先生的文章不仅仅是一篇論述苏联政权和提出对策的普通論文。它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宣告了国务院下了决心（至少是在3月15日左右的时候），并且已經准备好了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对克里姆林宮，透露它的計劃所依据的設想、估計和結論。

因此，X先生的文章不仅仅是对苏联行为的来源的分析。它也是說明美国外交政策的来源，至少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謂杜魯門主义这部分的来源的一个头等重要的文件。

我在本文中將把它看作这样一項文件而加以評論。但是我立刻要声明，我的批評并不是基于这样的意見或希望，即認為我們同苏联政府的冲突只是想象的，或者說这种冲突是可以避免、忽

視或者輕易解決的。我完全同意X先生的下列看法，即苏联的压力不能“靠魔术或空談使它消失”。我完全同意，除非有苏联力量所不得不尊重的另一个力量，主要是美国力量和它抗衡，阻止它扩张，否則苏联力量是必然要扩张的。但是我認為，而且將試圖在本文里証明，X先生所提出的战略概念和計劃是根本錯誤的和行不通的；要是执行这个計劃，将会大大浪費我們的資源和我們的威望。

1.

首先我們要指出，X先生的結論是基于一种乐观主义的預測，誰要是重讀一下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这也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做法。X先生說：“苏联力量……本身带着毁灭自己的种子，而且这种种子已經大为发芽滋长了”；他又說，如果“发生任何事件破坏党的团結和党作为政治工具的效力的話，苏俄可能在隔夜之間（原文如此）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他又說：“苏联社会很可能（原文如此）包含某些缺点，这些缺点最后将削弱它自己的整个的潜在力量。”

說到这种乐观的預言，X先生說，“它是既不能加以証明，也不能加以駁倒的。”可是他却得出結論說，美国應該根据“苏联的力量天生就是軟弱和短命的”这种假定来制訂計劃，而且認為仅仅根据这种并未加以証明的假定，我們就應該“抱着合理的信心采取一种牢牢遏制的政策，旨在教俄国人在他們显露有侵犯和平和稳定世界的利益的迹象的每一点上，都面临不可更改的对抗力量”。

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只有在最乐观的預言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才能成功的政策，很难寄予合理的信心。显然，一个健全的政策必須設想到可能出現的最不利的和最困难的情况，而不是依仗最有利的和最容易的情况。

事实上，X先生对他自己的分析也是十分缺乏信心的。因为他在描述了所謂在俄国露出侵犯迹象的每一点上配置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的牢牢遏制的政策之后，馬上感到有必要来进行自我

辯护，唯恐人家会批評，或者簡直是嘲笑說，这是“守株待兔”的政策。他辯护說，虽然他所提出的是守株待兔的政策，“实际上美国政策的可能性絕不限于守株待兔”。可是其他的可能性并不在国务院的权力范围之内：必須先要“使俄国共产主义的目的显得虛幻和唐吉訶德式的，使莫斯科的支持者的希望和热情大为减退，而且对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策施加額外的压力”，然后美国才“能够在世界人民中間造成普遍的印象，認為美国这个国家是目标明确的，能够順利解决內部問題和担負作为世界大国的責任的，而且具有充分的精神活力，足以在当代各种主要的思潮中居一定的地位”。

这无異于用关于美国的一相情愿的幻想来支持希望苏联崩溃的幻想。X先生的估計中一定有着严重的缺点。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說明，除非出現奇迹，除非一切胜利都属于我們，他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X先生的估計中毫无未雨綢繆的打算。沒有为恶运、管理上的缺点、錯誤和突然事件留有安全的余地。他要我們假定苏联的力量已經在衰敗。他要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的最高愿望馬上就会实现。然而他所推荐的政策是为了有效地对付“作为政治竞技场中的对手，而不是伙伴”的苏联。当我们进入竞技场准备起跑的时候，我們敢于假定苏联将蹣断腿，而美国身上会长出翅膀来飞速前进嗎？

X先生在他关于苏联行为和美国政策的文章的結尾处說，“对苏美关系进行深入思考的观察家……将会对上帝产生感激，因为他讓美国人民面对了这个不可調和的挑战，就迫使他們为了全民族的安全而不得不振作起来，接受历史明明白白交托給他們的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領導責任。”也許是这样的。也許X先生

已經猜透上帝的旨意，知道历史明明白白安排了什麼。但是，要求美国人民押宝，把他們“全民族的安全”押在一个他自己所謂既不能加以証明也不能加以駁倒的理論上，这未免有些过份吧？

X先生建議我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中，要“相应于苏联政策的轉移和策略行动，而在一系列不断轉移的地点和政治点上”，采取反措施。可是，决不能証明这是引导全人类的方法。因为如果历史真是有意安排由美国人来承担領導責任的話，这种領導也决不是在一系列不断轉移的地点和政治点上去适应于苏联政策的轉移和策略行动。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在十年到十五年的期間，莫斯科而非华盛顿将操有主动来出題目，来提出挑战，来选择进行斗争的場所，并挑选所用的武器。而X先生的建議充其量也只能象他所說，最終使苏联力量由于遭受“挫折”而自行灭亡或“烂熟”，如果我們能够长期防止它取得胜利的話。

这是一个慘淡的結論。据我看，X先生是陷在这个結論里拔不出来了，因为当他对苏联的行为进行越来越多的思索的时候，他越来越忘記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行为。因为固然苏联的力量經過十年或十五年的遏制有可能受挫折而死亡，可是这样一个結論还只有半边的根据，他还需要回答剩下来的關鍵問題：西方世界能不能执行这种遏制政策？X先生不仅沒有回答這一問題，他居然好象理所当然似地說道，要是西方世界有力量和有智謀来遏制苏联力量十年到十五年的話，苏联将感到很为难呢。

2.

固然，西方世界的力量是強大的，我們也可以設想西方世界的智謀是不小的。可是，有許多重大的理由足以叫我們擔憂：我們所具有的這種力量和智謀恰恰是不適合於執行遏制政策的。

譬如說，X先生怎樣能夠在美國憲法的總規定下作出安排，使國務院能夠經常掌握着足夠數量的款項和軍事力量，可以隨時在全地球上不斷轉移的地点實行“反擊”呢？他是不是打算要求國會開一張從國庫領錢的空白支票，並且無條件地授權國務院使用武裝力量呢？如果還想保持美國憲法制度的話，這樣做是辦不到的。那麼，他是不是打算在俄國人每一次“顯露有侵犯和平和穩定世界的利益的迹象”時，來申請撥款和授權呢？如果這是他對付一個獨裁政權的策略行動的計劃，他將會帶着太少的力量趕到發生侵犯的地点，而且會到得太晚的。要是俄國人打算侵犯的話，當美國國會還沒有準備好開會听取意見的時候，俄國人就會已經侵犯完了。

經常轉移和採取策略手段的政策，對於蘇聯的政府制度也許是適合的，因為正象X先生所說，蘇聯政府具有耐心的堅持性。可是這種政策對於美國的政府制度是不適合的。

這樣一種政策尤其不適合於美國的經濟，因為美國經濟是沒有劃一組織和不受控制的，因此不能夠按照計劃進行管理。而除非國務院能夠規劃和指揮進出口貿易，遏制政策是實行不了的。因為這種政策要求“相當於蘇聯政策的轉移和策略行動，而在不斷轉移的地点和政治点上”送交或者拒絕送交美國的貨物。

这就是說，要由X先生和国务院的政策制訂人，而不是由世界市場的供求关系，来随时决定哪一部分美国生产的商品在国内出卖，哪一部分可供輸出，然后是卖給、借給或者送給这一个外国，而不是那一个外国。国务院要能够分配美国的工农业产品，把供輸出的商品按照定額分配給参加遏制苏联的各个国家，而且要能够鑑別这些国家，正确而迅速地判定每一个国家必須給多少，每一个国家又能够扣紧多少而不致发生危險，以便所有这些国家能够坚守住防守俄国人的陣綫。

因此如果我們真的用X先生所建議的政策去对付克里姆林宮对美国社会的挑战的話，我們在未來十年到十五年期間將不得不同莫斯科所統一制訂和指揮的苏維埃制度进行較量。在我看来，要是X先生認為象我們这样一个自由的和沒有統一指揮的經濟能够由外交制訂人用来在一系列經常轉移的地点和政治点上对一个有計劃的經濟进行外交战的話，那他肯定是想錯了。他的这种建議实际上是要我們在对苏联最有利的戰場上，而且恰恰是用苏联具有明显优势的工具、程序和武器来对付苏联的挑战。

3.

我很难理解X先生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荒謬的战略方案。因为他告訴我們，苏联的力量“是不能靠它的对手的一次胜利就輕易击败或者逼退的”；他又說，“苏联所具有的有耐心的坚持性”是不能够用“突击式的行动来进行有效的抗衡的”。他的这些话无疑是对的。然而他自己的政策却正是要我們去采取一系列突击式的行动，他要美国在俄国人进行侵犯的地点和時間去使用“对抗力量”。

他自己承認，单凭一次胜利不能够輕易地击败或者逼退克里姆林宫的有耐心的坚持力量。可是X先生又說，美国应该爭取一系列的胜利，以使俄国人“在外交战綫的个别段落上后退”。然后怎样呢？当美国迫使克里姆林宫“无限地面对挫折”以后，“最后”将发生“苏联力量的崩潰或者逐漸的烂熟”。

但是我們并没有理由相信，美国能够在所有的段落上都調集“不可更改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很大的一块地方，而美国的軍事力量縱然强大，也有它的某些限制，如果要有效地加以利用，必須考虑到这些限制。我們美国人是生活在一个象島一样的大陆上。在我們和冲突地区之間隔着大洋。我們的人口相对來說，是少的，在战争时期其中大部分必須从事于生产、运输和服务于构成我們的軍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器。比起俄国来，美国沒有充足的陆軍后备力量。我們的海軍控制着海洋；我們持有主要的进攻武器。但是在欧亚大陆的內陆，象我們正在希腊山区所領教的，可能有很多的“个别段落”，在那里只能用陆軍作“对抗

力量”。

这些考虑必然要决定美国的军事战略，而且每逢外交的任务在于对付力量的冲突和角斗的时候，也要决定外交的战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人必须使用我们所确实具有的力量，而不是我们所不具有的那种力量。他必须在能够使用那种力量的地方使用它。他必须避免在敌人可以使用优势武器的那些“外交战线”的个别段落上和敌人进行较量。可是X先生所阐明的牢牢遏制的政策却忽略了这些战术考虑。它对不同的段落没有加以区分。它要求美国在全线的“每一点上”，都使俄国人面临对抗力量，而不是在我们所选择的那些点，即我们所拥有的海空力量可以发挥最大作用的点上。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复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远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

4.

X先生所推荐的这个遏制政策，要求在欧洲和亚洲內地的“各地段”使用美国的經濟的、政治的，以及归根到底也包括軍事的力量。而象我所指出的，这样做将需要地面部队，也就是陸軍后备力量，而这是我們所不具备的。

美国凭自己的軍事力量不能够“在俄国人显露有侵犯迹象的每一点上”遏制他們这样广闊的压力。美国不能具有由美国部队构成的、現成的“不可更改的对抗力量”。因此，X先生所需要的对抗力量必須由中国人、阿富汗人、伊朗人、土耳其人、庫尔德人、阿拉伯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以及反苏的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芬兰人和德国人来組成。

要执行这个政策，只能靠招募、津貼和支持一支由卫星国、雇員、附庸和傀儡組成的杂牌軍。因此，执行遏制政策的工具乃是处在苏联外緣的那些无組織的、內部分裂的、軟弱的或者混乱的民族、部落和派系的联合陣綫。

要在現代强国之間組織联合陣綫，即使在战时形势所逼的情况下，也是一件极难办好的事。而要把一些內部分裂的、軟弱的和未成熟的国家組織成联合陣綫，来保持一个可能要維持十年到十五年的、长期的外交包围圈，我認为是困难得无以复加的。

尽管口头上不承認，实际上这将需要美国对我們打算去組織、去保护、去領導和去利用的这个联合陣綫的所有成員的內政不断进行复杂的干涉。我們在海外的外交代表将需要有万无一失

的判断力，能够正确而迅速地确定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可靠的遏制分子。在国内，我们的国会和人民必须随时准备好支持我们的外交代表所作出的判断，听从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提名谁，津贴谁，为谁粉刷，把谁看得比事实上更好一些，吸收谁做我们的雇员和盟友。

X先生向我们提出的前景，就是要无限期地维持这样一个联合阵线，一直到最后苏联力量由于挫折而崩溃或者烂熟时为止。这可不是一个光明的前景。即使假定我们的外交代表全都善于机巧地干涉亚洲、中东和欧洲各国的内政（事实上我们不应该作这样的假定），即使假使美国人民会在动用款项和军事力量方面支持他们，给予空白支票（国务院却不能作这样的假定），这仍然不是一个光明的前景。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联合阵线所针对的苏联是会进行抵抗和采取反措施的。

在争夺这一大摊不稳定的国家的复杂斗争中，苏联占着极大的优势。因为如果想取胜的话，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卫星国组织成为一些统一的、有秩序的和比较丰足的国家。而苏联却可以瓦解这些本来就无组织的国家，分裂这些本来充满内争的人民，煽动他们本来就很不满，从而把我们击败。

事实上，欧亚大陆上环绕苏联的这一圈边缘地带，并不是能够建立X先生所谓的“攻不破的藩篱”的地方。卫星国家和傀儡政府并不是适于用来建立攻不破的藩篱的材料。这个政策所要求的那种间接的外交战，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寄托在我们不可能有多少了解的卫星国、傀儡、雇员和代理人的身上。他们常常会根据自己的理由和判断采取行动，使我们面临我们所没有打算的既成事实和没有准备好应付的危机。这个“攻不破的藩篱”将会使我们面对无止境的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要